

# 談臺北市實施社會服務民營化的方向與策略

沈慶盈

## 一、前言

民營化有多種意義與類型。就社會福利服務的民營化而言，其意義為運用市場力量來達成原先由政府機關主導的社會目的（Cordes, Henig, & Twombly, 2001），而主要型式則是由政府透過契約外包或財務補助，以鼓勵民間或私立機構提供福利服務（廖俊松，1999），亦即將福利服務任務的執行權移轉由受託單位承擔，但任務的管轄權與責任仍由政府負責，此乃所謂的「功能民營化」的類型（李玉君，2003，78）。

對於社會福利服務民營化的討論已有一段時間，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趙碧華，1996；廖俊松，1999；劉淑瓊，2001），倡議民營化的主要論點包括：（一）提高行政及服務效率與提升服務品質；（二）增加服務的多樣性、彈性與創新性；（三）運用競爭機制以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四）提升社會的參與及發掘資源；（五）降低政府人事及財政負擔；（六）協調與整合社會資源網絡。鄭讚源（1997）則認為此種政府提供資源交由民間執行的合作關係，正好可以使雙方的優缺點互補。至於反對民營化的批評中，較常被提到的可能缺失為：（一）較難處遇的個

案受到馬虎的對待；（二）雇用技術差、工資低的員工，導致服務品質降低；（三）受委託單位在契約、制度或行政手續的要求下，往往需修正服務宗旨或服務對象的優先順序，影響機構存在的獨特使命（廖俊松，1999；劉淑瓊，2001）。

由文獻的討論可知民營化並非只要推動就一定能正向的結果，然而臺灣的社會服務民營化從 1980 年代開始逐漸普及，隨後在 1990 年代成為提供福利服務的主流價值（林萬億，1998），近年更在政府人事精簡的政策下，成為社政單位在提供福利服務時不得不然的選擇（李玉君，2003），而且預估在短期內將不至於有所轉變（劉淑瓊，2001）。

陳小紅（1997）分析臺灣各地區的福利服務資源分配狀況，結果指出一千兩百多家的各類福利服務機構只有 22.97% 為公立機構，高達 69.42% 屬於私立機構，其中又以公益團體及基金會所占比例最高，因此認為未來推動福利服務民營化的空間相當大。有些學者則建議不需將受委託單位限制在非營利的範圍，而應適時且適當地讓營利機構亦參與福利服務的提供，以創造更多元、更能保障人民福利的服務模

式(郭登聰, 1999; 李玉君, 2003)。事實上, 在國外許多營利機構已提供兒童寄養或庇護服務、醫療與精神醫療服務、養護之家及日間照顧等服務, 而臺灣亦已有營利機構跨足如兒童托育、老人安養等福利服務領域, 並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民國 90 年 5 月, 內政部和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更成立「福利產業推動小組」, 希望整合社會、衛生及勞工政策, 並結合民間資源, 共同發展福利服務照顧體系, 可能進一步擴大營利機構進入福利服務的領域。李玉君(2003)則從法治觀點指出: 福利服務民營化並無違憲之疑慮, 亦無任務本質不適當的問題。由上述資料可推測, 在既不違憲、違法, 政府大力推動, 民間動能充沛, 且營利機構亦躍躍欲試的情況下, 臺灣社會福利服務的民營化趨勢在可見未來必然會更加蓬勃發展。

由文獻的討論可知社會服務的民營化並非只要實施就一定能正向的結果, 在民營化幾乎已成勢不可擋的潮流之時, 我們更應深切反省臺灣推動福利服務民營化的經驗。事實上, 已有許多專家學者探討臺灣實施社會服務民營化的可能缺點及執行過程所遭遇的問題, 然而對問題的成因看法並不一致, 對於具體的因應對策或未來工作方向的建議當然更無定論。有關民營化的討論牽涉到價值哲學、理論概念與實務執行等層面, 使其所遭遇的問題非常複雜, 無法短時間內找出一個眾所接受的解決方式, 這可能是國內雖然持續推動民營化, 但卻似乎仍然沒有一個明確方向或策略的主要原因。

服務資源的整合與福利服務的民營化早已是當前有關福利服務輸送的主要議題與趨勢, 兩者皆是因應當前服務輸送體系的分歧、缺乏連結與階層化而產生, 且皆認為能重新建構福利服務輸送系統使其變的更有效率與效能。本文乃嘗試結合社會服務民營化與服務資源整合的概念, 並以臺北市為範圍, 建議臺北市政府實施社會服務民營化的規劃方向與可行策略, 以期達成建構一個具有效率與效能的福利服務輸送系統的目標, 進而提升服務的品質。

## 二、我國實施社會服務民營化所遭遇的問題與相關因應建議

國內社會服務民營化的背景與國外不同, 國外大多是公部門已提供相當的福利資源或民間資源已相當充沛才提倡民間或市場介入, 國內則是在公部門福利供給不足且民間資源亦相對缺乏時, 就已開始倡導民營化(施教裕, 1997)。劉淑瓊(1998)則指出人事精簡政策及公部門在社會福利資源投入的不足促使社政部門排除其他輸送社會福利服務的模式, 而將社會服務的民營化列為唯一的選項。在此狀況下推動社會服務民營化, 使得不管是政府或民間機構都遭遇到很多的問題或困難。

陳菊(1997)指出社政單位委託民間辦理社會福利事業時所面臨的問題有: (一)公設民營機構的目標與屬性不明確, 以致無法明確界定彼此的權利義務; (二)有能力及意願的民間福利團體不足; (三)評估契約

執行的成果有困難；(四)政府監督契約的管理技術與人力不足；(五)委託經費補助的額度與範圍缺乏彼此認同的標準；(六)籌設公設民營機構遭遇的問題非社政人員所能立即解決；(七)合作契約中止時的財產與個案資料歸屬及個案轉介的問題。施教裕（1997）則認為相關問題有：(一)民間機構的參與規劃或授權不足導致執行不便；(二)供給不足導致甄選不公和資源分配不當的質疑；(三)法令及契約的束縛過多；(四)雙方難以坦誠配合；(五)行政監督或專業督導不足；(六)補助經費偏低或不足；(七)契約不確定或不夠長；(八)會計核銷作業繁複；(九)行政及專業責任之歸屬不清；(十)執行爭議或糾紛的申訴管道缺乏。劉淑瓊（2001）則提到有些委託方案的服務成本明顯高於公部門自辦，卻礙於政府政策而仍繼續執行；有些受託機構難以溝通，卻因缺乏競爭者而只能接受較差的服務品質。林萬億（1998）則指出我國在民營化的過程中，由於競爭不足、定位不明及監督困難等因素使得民間社會福利機構有發展出大型的連鎖組織的現象，可能造成市場競爭性更低。而我國的社會捐款亦傾向流入大型的知名機構，大型組織的發展可能影響其他小型機構獲得資源的機會，甚至導致生存危機。而綜合文獻的論點，我國實施社會服務民營化時所產生的問題可歸納為資源分配機制不公、心態與能力不強、監督或專業督導無方、政策與制度不明、角色與權責不清、經費補助不足、法源及成效評估缺乏等八項（趙碧華，2003）。其他文獻所呈現的問題大多不出以上的範圍。郭登

聰（1998）則指出整個民營化的問題實質上呈現的是政府欠缺整體性的思考。

許多專家學者曾針對社會服務的民營化及其相關問題提出建議與因應之道，例如有些學者著重於討論民營化的條件。Donahue（1989，引自 Gormley，1994）提出民營化的三項決定原則為：(一)工作內容能事先加以具體說明，且工作表現能加以評鑑；(二)契約受委託者的工作表現令人失望或無法接受時，能夠容易地加以替換；(三)政府較重視結果而非方法。Kettle（1993，引自 Gormley，1994）的民營化原則則為：(一)政府知道它在買些什麼；(二)政府知道誰能提供它所要購買的東西；(三)政府知道如何判斷它所要購買的東西。由於 Donahue & Kettle 的原則較適用於硬體服務，如食物、洗衣或街道清掃等，Gormley（1994）乃增加三個規範：(一)私立機構在該政策領域具有相當的經驗與受到尊敬；(二)私立機構的處遇是否需要能由政府自由干預；(三)受委託的私立機構尚提供其他有用的社會服務。由此可知，社會服務民營化的先決條件為：(一)能具體說明服務內容；(二)能評鑑服務成果；(三)受託單位需有足夠的經驗與能力，且能提供多項服務；(四)政府有權力介入服務與合理更換受託單位。

有些則從受託單位的選擇著手，像鄭讚源（1997）建議受託對象應選擇營運績效良好的機構，並定期進行機構評鑑、追蹤與輔導，但是由於國內的公私社會福利資源不足，因此在民營化初期則可鼓勵尚稱健全的機構參與。劉淑瓊（1998）亦認

為在機構委託上應審慎緩進，其次應加強管理能力與監督機構的服務品質，第三則應與民間機構建立平等互惠關係，且需提供必要資源，最後則應發展多元的福利服務輸送管道，從不同來源取得專業能力與經費資源。施教裕（1997）則認為政府應以培植民間機構的服務能力為主要任務，並建議分三個階段進行：（一）倡導扶植期：增加民間社福機構的服務容量與能力；（二）輔導協助期：提升民間社福機構的專業能力與服務品質；（三）分工合作期：確立第三部門或準市場的角色與地位。

有些學者著重在契約的類型與範圍，例如黃源協和許智玲（1997）指出契約的類型一般可分為三種：（一）包裹式契約：契約載明購買服務的價格與數量；（二）論量計酬式契約：保證以固定價格購買某一最低限量的服務；（三）論件計酬式契約：購買的服務以論件為基準。他們認為就財源的穩定性而言，包裹式的契約較佳。劉淑瓊（2001）則提到香港社會福利署為了提高績效責任與服務品質，已開始推動整筆撥款與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社會服務包裹式契約或整筆撥款的方式就像是公共工程契約，依據工程完成的進度分期撥款，由得標單位開立收據即可，不會要求得標單位拿買水泥、鋼筋、木材等收據來核銷。其實在民營化的趨勢下，國外已推出許多整筆撥款或包裹式契約，以降低業務成本與行政手續，並藉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Felty & Jones（1998）則認為為了避免興趣的衝突，契約應足夠小以確保社區和功能的連結，因此政府最好以社區為單位與私

立機構簽訂契約。

另有一些學者關注政府與民間機構的關係與管理機制。「夥伴關係」是許多學者認為在民營化的過程中政府與民間單位應建立與維持的關係，例如劉淑瓊（1998）認為政府應與民間機構建立平等互惠的關係而非控制。至於達成夥伴關係的機制則可以由政府設立一個充分授權，由民間專業機構聯合經營的督導、評估和監督的社會福利聯盟機構（楊孝潔，1997）。蘇洺賢（2000）則指出組織間合作的管理機制會因不同的資源類型而不同，當組織間合作的資源類型為知識和人力資源等隱性資源時，管理機制會傾向以關係機制來管理，亦即倚賴彼此長期往來的信任與共識關係來管理；而當組織間合作的資源類型為實體或財務等資源時，管理機制會傾向以科層機制來管理，亦即倚賴威權、法令或雙方訂定的契約來管理。對政府而言，它所提供的是財務資源，因此傾向於以科層機制來管理，民間機構所提供的則是知識與人力資源，因此傾向於要求平等關係。不過，不同的管理機制常因不同情境而不同，且可以加以組合併用（蘇洺賢，2000）。因此，政府對民間受託單位的管理應該科層機制與關係機制並用，對剛接受委託或品質不佳機構的管理就要加強科層機制的監督控制，對於長期合作或服務品質優良機構的管理就要偏重關係機制的運用。

還有一些專家學者關注市場的競爭性，畢竟市場競爭是支持民營化的一個重要概念。有許多學者認同市場競爭的重要性，像 Felty & Jones（1998）認為如果沒

有競爭，則整合福利服務輸送系統的動機將減弱，因此應鼓勵競爭，並維持一個受託機構服務品質不佳時的替代機構。鄭讚源（1997）亦認為因國內的公私社會福利資源不足，政府最好維持一定的服務量，以免受制於民間，且能與民間競爭。Gormley（1994）則介紹美國鳳凰城建立了一個公私立機構皆可競爭的投標過程，如此則當民間市場惡化時，公部門較能夠接手。林萬億（1997，引自趙碧華，2003）亦建議如果當地資源豐富宜採用市場競爭模式招標，如資源缺乏可採扶植本地資源模式，以避免民間社福資源的連鎖化與寡占。

雖然有許多的專家學者針對我國社會福利服務民營化的實施提出建議與因應之道，但似乎仍缺乏一個整體的方向規劃，因此本文在下一節嘗試從整合福利服務輸送系統著手來發展未來民營化的實施方向與可行策略。不過城鄉的資源差距很大，就臺北市而言，臺北市政府或民間社會福利服務資源皆較臺灣其他地區豐富是一個少有爭議的事實，而其委託民間經營或提供的福利服務項目不管是在種類或數量上亦較其他縣市來得多元。就服務對象而言，包括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等，而服務內容則涵蓋住宿收容、安置、日間照顧、庇護、綜合性服務等（陳菊，1997）。以目前的老人福利為例，在十三所老人服務中心部分，有七所公辦公營，四所公設民營及兩所補助辦理；在安養護機構部分，有三所公立機構，四所公設民營機構及一百多家的私立立案機構；

在老人照顧部分則已設置了七個日間照顧中心，並委託十二個單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此外尚有一所公設民營的永樂老人人力資源中心提供銀髮族的人力資源規劃與權益倡導等服務。由於作者擔任過各類老人福利服務在委託民間機構辦理時的評選委員與評鑑委員，因此以老人福利服務為例討論臺北市民營化的方向與策略。

### 三、臺北市實施社會服務民營化的方向與策略規劃 ——以老人福利為例

趙碧華（1996）認為有效推動民營化所需具備的條件有：（一）規劃具體的服務模式並建立福利需求的優先次序；（二）明確釐清政府、雇主和民間機構的責任與分工；（三）建立補助內容、程度和品質管制的標準；（四）建立證照制度，確保社會福利服務的品質；（五）建立福利服務品質的監督考核制度。陳菊（1997）亦認為政府委託民間辦理社會福利的前提要件應包括以下六項：（一）委託的目標要明確；（二）福利服務的供給市場應有競爭；（三）有關民營化的委託與執行的法令應完備；（四）受委託單位的專業人員與政府部門的契約管理人才應配合業務成長；（五）委託單位與受託單位應有一致共識；（六）市民、政府行政人員與受託單位應有良好的溝通。但我國之所以會推動民營化的主要原因本就出自於節省人力與經費的期待，政府投入民營化的人力與經費不足可說是一種常態現象，因此當然無法在滿足上述條件後才加以實施，也就造

成當前民營化過程的事先未良好規劃，事後又無力有效監督的困境。

就作者本身擔任各類老人福利的評選委員與評鑑委員的經驗，臺北市老人福利在委託民間單位辦理時曾經遭遇的主要困難則有：(一)一項福利同時辦理分區招標，導致得標機構品質參差不一，甚至參與機構不足；(二)明訂評鑑指標與辦理年度機構評鑑來提升受託機構之專業能力，但效果有限，且反而限制機構的創造力；(三)彼此對評鑑指標不易有共識，無法著重於成果部分；(四)受託機構評鑑成績不佳，導致工作人員離職；(五)有些受託單位人員流動率過大，專業經驗無法累積與傳承；(六)社會局臨時交辦事項過多，導致機構反彈；(七)有些受託機構態度強勢，彼此互信不足，關係緊張；(八)有些服務項目，機構抱怨委託經費不足，社會局則認為補助經費過高，超過自辦所需花費。

針對民營化所遭遇的問題，劉淑瓊（2001）認為現階段民營化政策規劃與執行應以績效評鑑為重點。由於福利服務的民營化基本上是將社會服務視之為商品，因此政府必須扮演被告知的消費者的角色，監督受委託機構的服務品質則是民營化過程所必須完成的事項。Felty & Jones（1998）認為如要扮演被告知的消費者的角色，政府必須每月進行機構實地訪視，可惜政府往往沒有經費進行實地訪視，即使去了也不見得能看到真相；另一個方法則是要求機構提交服務與成果報告，然而社會服務所面臨的狀況非常複雜且主觀，服務提供者對於成果的看法亦有很大的差

異。因此，他們建議的解決方法是整合服務系統。

整合福利服務輸送系統的目的是為了能快速反應與滿足案主的多重需求。許多文獻探討過政府、公私立機構、企業界、社區領導者和其他人員間的協調合作與整合資源的重要性（沈慶盈，2000）。事實上，服務資源的整合與福利服務的民營化早已是當前有關福利服務輸送的主要議題與趨勢，兩者皆是因應當前服務輸送體系的分歧、缺乏連結與階層化而產生，且皆認為能使福利服務的輸送變的更有效率與效能。整合服務資源的理由主要為可以彼此分享匱乏的資源與寶貴的工作經驗，增進對問題的瞭解，避免或減少服務資源的重疊和浪費，進而提供多元的服務類型，提升服務的可及性與品質（沈慶盈，2000）。O'Looney（1993）則根據文獻指出服務整合可以降低接案、資格審查、家訪與問題評估及個案管理等工作的重複，且可以降低轉介與行政業務費用。由以上的討論，作者認為臺北市實施社會服務民營化的可行方向為建構整合的福利服務輸送系統，換句話說，就是要建構一個民營化的福利服務輸送系統，以同時達成社會服務民營化與資源整合的目標。就作者的經驗認知，臺北市的老人福利服務仍是以殘補式的思考模式來建構，單一服務機構的設立目標就未能有具體而完整的考量，更別談不同的福利服務之間有整體性的規劃。而從整合服務資源著手，正好可以重新思考如何建構一個完整的老人福利服務體系，並從整體考量各項福利服務的目標，如此

不僅有助於釐清各單位，如老人服務中心的目標與功能定位，更能由此發展適合的成果評鑑指標。

至於臺北市要建構何種服務輸送系統？O'Looney（1993）將服務輸送系統以公立或私立、鬆散或緊密的服務整合及有無競爭三個要素區分為八種組織模式，然後依據消費者能否向服務提供者表達其需求及能否選擇離開服務兩個標準來探討每個模式的優缺點。結果指出在民營化（由私立機構經營）的狀況下，一個具有競爭的、緊密服務整合的福利服務輸送系統（稱為競爭管理模式 *managed-competiton model*）是最佳的選擇，而且此種模式適用於城市地區以便能提供足夠的服務人口群來維持競爭。

至於執行的策略為何？如何克服政府人力、經費及監督不足等問題？作者認為策略之一為擴大民營化的範圍，並將釋放出來的人力用於監督服務品質。許多專家學者認為民營化時，政府與民間機構的角色應隨之轉變。鄭讚源（1997）認為在社會福利服務民營化中，政府的角色為確定民營化的目標，建立評估標準以監督服務品質及鼓勵市場競爭與創新。民間機構則主要是扮演服務提供者的角色。李玉君（2003，88）亦認為民營化時，政府的角色功能、權責與義務需重新調整，亦即「國家由福利服務提供者之角色，轉換為政策之規劃者與監督者的角色」。傳統上，社會福利的提供是由政府直接將福利服務交到受照顧者的手上，在民營化的理念下，政府應該可以退居第二線，由福利提供者的

角色轉為福利支援與品質監督者的角色，以培育及轉化民間與社區力量為主，讓民間機構與社區能負起部分提供福利服務的責任。在此理念下，除非有特殊考量或民間尚力有未逮，否則大部分的直接服務項目可逐漸分區委託民間經營，社政單位的人力則以政策與方案規劃、行政支援、專業督導與服務品質監督及提供尚未或未能委託民間經營的直接服務為主。具體而言，目前市政府的公辦公營機構，如一些老人服務中心、社服中心等駐府外單位，可持續分區轉為民營，人力則應加以重新訓練，並提升其研究開發能力，以提供專業督導與監督委託機構的服務品質。

第二個策略為進行多種服務項目的統一委託或補助，並將節省下來的經費用於社政單位本身的轉型與人力訓練及協助民間機構進行合作協調。Felty & Jones（1998）認為為了降低成本及促進社區資源的整合，應將個人和家庭所需的由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皆包含於一個大而多樣化的契約中。在作法上，社會局各科應先整理可以民營化的所有服務項目，規劃整合型的服務契約，並調整目前各項服務的委託時程，以便能進行各項服務的聯合委託。舉例而言，老人服務的老人服務中心、獨居老人照顧、日間照顧、居家照顧及安養護機構等皆以一或二個行政區為範圍統一招標，如此在行政作業上有所簡化，可以節省招標作業與經費，且因委託服務項目多，整體委託經費應可降低，如此既可將省下來的錢用來進行內部轉型與訓練，民間單位亦應較不會抱怨補助經費不足。事

實上，就作者參與市政府機構評鑑多年的經驗而言，同時接受不同服務項目委託的民間機構確實會自行整合資源以降低營運成本，連帶使服務效率有所提升，且服務品質亦有一定的水準。至於要推出幾個行政區出來委託民間經營，則應考量社會局的監督容量與民間機構的動能而定。

此種將各項委託服務整合於單一契約進行統一招標的方式，因為委託項目多樣且金額龐大，所以有興趣參加招標的機構應會增加，可以促進競爭。更重要的是，因為很少有單一民間機構可以同時提供如此多樣的服務內容，勢必需要與其他機構結合以參與競爭。Hardcastle、Wenocur & Powers (1997, 引自沈慶盈, 2000) 就指出透過網絡來獲得其它機構的資源及与其它機構合併資源以抓住外來的機會是機構願意參與與維持服務網絡的主要原因，可見將多種服務項目同時委託給一個機構或聯盟，應可以促進機構間的協調合作與資源整合，進而達成建構整合的福利服務輸送網絡的目標。

第三個策略為營造資源整合的氣氛與環境，包括強烈的政策支持與要求及克服資源整合的障礙。劉弘煌、沈慶盈、施睿誼、陳君儀 (2001) 的研究發現有：決策權高層主管的投入對臺北市社會福利社區化的執行有決定性的影響。Yessian (1995, 引自沈慶盈, 2000) 也指出由一個中央集權的地方權威機構負責服務整合有其價值存在，另外應清楚定義明確而小範圍的服務對象與具體的服務內容，確保整合方案具有資源運用或控制規範的彈性，並進行

持續性的評估與要求責信。O'Looney (1993) 認為可以訂定方案設計、人事或服務的標準或管理服務技術的規則，詳細說明管理結構或消費者選擇的類型，輕微或中間程度地控制經費或預算自主權等來達成服務的緊密整合。因此，作者建議應由專責的市府高層主管親自領導與投入社會福利民營化的實施，發展具體的服務契約與成果評鑑指標，並引入整筆撥款或包裹式契約型式，依據服務成果來辦理經費核銷以簡化核銷手續及提供受託機構經費運用的彈性。此外，在與受委託單位的契約合作關係剛建立的頭一、二年應緊密監督服務品質，並提供必要的專業督導，如一段時間無法改善品質則應執行解約。等到與民間機構間的合作關係穩定，服務品質可以確保，政府與民間機構的信任關係與共識已經建立，則花在監督、評鑑與督導的時間就可大量降低，此時就可繼續推動其他行政區的福利服務統一委託。作者認為只要民間機構確認政府的民營化政策方向，在平時應就會開始發展合作的關係，以便機會來時可以及時掌握，因此有助於福利服務輸送網絡的建構。

#### 四、結 論

在可見的未來，社會福利服務的民營化仍會繼續推動，而福利服務資源的整合亦會是一個熱門的討論議題。為了確保社會服務目的的達成，政府單位與民間機構人員皆應認知有關民營化的爭論與影響，並致力於減少或避免民營化過程中所產生



的缺失。本文建議以整合福利服務輸送系統做為臺北市實施民營化的努力方向，並提出擴大民營化範圍、統一委託所有的民營化服務項目及營造資源整合的氣氛與環境等執行策略，以避免未來民營化的實施仍然面臨相同的問題與困難，更希望能建構一個整合的福利服務輸送系統，提供具有效率、效能及高品質的福利服務。

由於民營化的推動方向不易形成具體共識，可預估本文所提出的淺見可能會遭遇嚴格的批評與指教。但是社會服務的民

營化已持續在推動，無法等待大家慢慢觀察與凝聚共識，因此本文希望拋出一個政府單位與民間機構可嘗試的工作方向，其目的則在於拋磚引玉，希望吸引政府、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共同思考與規劃我國民營化的可行方向與具體作法，並加以落實，以使臺灣社會服務的民營化，在不得不然的發展趨勢下，仍能在政府與民間雙贏的狀況下，達成原先設定的社會目的。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副教授）

## 參考文獻

- 王于綾、林萬億（1997）購買服務契約對民間福利機構影響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80，60—69。
- 李玉君（2003）社會福利民營化法律觀點之探討，月旦法學，102，74—93。
- 沈慶盈（2000）從組織間關係談社會服務資源的整合，社區發展，89，145—155。
- 林萬億（1998）社會福利民營化：停看聽，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臺灣社會福利發展—過去、現在、未來」學術研討會。
- 施教裕（1997）民間福利機構團體因應民營化之現況、問題與策略，社區發展季刊，80，37—55。
- 郭登聰（1998）政府與民間的關係再造：「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草案）與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的比較論述，思與言，36（4），147—192。
- 郭登聰（1999）福利與營利的對話—社會福利民營化的另類思考，社區發展季刊，85，142—155。
- 陳小紅（1997）臺灣地區社會福利機構分佈與各級政府財源支出分配的初步分析，研考雙月刊，20—38。
- 陳菊（1997）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公設民營現況、面臨問題與因應之道，社區發展季刊，80，17—25。
- 黃源協、許智玲（1997）福利服務民營化趨勢下的志願部門—英國經驗的探討，社區發展季刊，80，88—102。
- 楊孝滌（1997）社會福利事業民營化後政府介入與督導體系之規畫，社區發展季刊，80，

56—59。

- 廖俊松（1999）民營化之外—福利國家民營化的省思，空大行政學報，53—75。
- 趙碧華（1996）因應社會福利民營化之社政工作初探，社區發展季刊，75，48—56。
- 趙碧華（2003）社會福利民營化的迷思：公部門的困境？私部門的願景？—社會福利資源配置的思考，東吳社會工作學報，9，1—44。
- 劉弘煌、沈慶盈、施睿誼、陳君儀（2001）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之研究—以臺北市文山區為例，實踐學報，32，1—24。
- 劉淑瓊（1997）依賴與對抗—論福利服務契約委託下政府與民間受託單位間的關係，社區發展季刊，80，113—129。
- 劉淑瓊（2001）社會服務「民營化」再探：迷思與現實，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5（2），7—56。
- 劉淑瓊（1997）當前「公設民營」困境之回溯與前瞻—以臺北市政府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臺灣社會福利發展—過去、現在、未來」學術研討會。
- 鄭讚源（1997）既競爭又合作、既依賴又自主：社會福利民營化過程中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之角色與定位，社區發展季刊，80，79—87。
- 蘇洺賢（2000）我國非營利組織跨組織合作關係類型及管理機制之研究，靜宜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Austin, M. J. (2003)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in the Era of Welfare Reform. *Nonprofit &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2(1), 97-114.
- Cords, J., Henig, J. R., & Twombly, E. C. (2001) Nonprofit human service providers in an era of privatization: Toward a theory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sponse. *Policy Studies Review*, 18(4), 91-110.
- Kramer, R. M. (2000) A third sector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1(1), 1-23.
- Gormley, W. T. (1994) Privatization revisited. *Policy Studies Review*, 13(3/4), 215-234.
- Felty, D. W. & Jones, M. B. (1998) Human services at risk. *Social Service Review*, 72(2), 192-208.
- O'Looney, J. (1993) Beyond privatization and service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al models for service delivery. *Social Service Review*, 501-534.